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JINDAI YILAI RIBEN DE ZHONGGUOGUAN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杨栋梁 主编

第六卷 (1972—2010)

田庆立 程永明 著

本卷阐述了中日复交以来（1972—2010年）日本政界人士、经济界人士和普通国民的中国观的演进轨迹和发展特征。依循历史发展的脉络，集中对不同时期日本各界人士中居于主流的对华认识进行系统地梳理和阐释。日本各界人士对华观的变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及中国国家实力的消长紧密关联。日本各界人士的对华认识在由冷战时代向后冷战时代演进的过程中，实现了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嬗变，经历了从“建设性接触”到“战略性防范”的变迁，对中国的定位逐步完成了由“友好伙伴”向“竞争对手”角色的界定。日本各界人士中国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竞相作用的“合力”结果。显然，就日本各界人士对中国的认知而言，往往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征。

上架建议 历史

ISBN 978-7-214-08154-4



9 787214 081544 >

定价：35.00 元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JINDAI YILAI RIBEN DE ZHONGGUOGUAN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杨栋梁 主编

第六卷 (1972—2010)

田庆立 程永明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第6卷, 1972—2010/田庆立, 程永明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5

(凤凰文库. 历史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8154-4

I. ①近… II. ①田… ②程… III. ①汉学—研究—日本—1972~2010②对华政策—研究—日本—1972~2010 IV. ①K207.8②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8570 号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杨栋梁 主编

第六卷(1972—2010)

田庆立 程永明 著

策 划 编 辑 王保顶

责 任 编 辑 张晓薇

装 帧 设 计 黄 炜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1 304 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插页 4

字 数 31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8154-4

定 价 3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目 录

第一章 中日复交初期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1972—1978 年) 1

一 中日复交初期日本政界的对华认识 1

1. 自民党内围绕中日复交的论争 2
2. 在野党的对华认识和行动 9
3. 田中角荣的中国观 15
4. 围绕反霸条款的战略之争 20
5. 福田内阁的缔约认识及行动 27

二 中日复交初期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31

1. 日本经济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33
2. 积极推动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42
3. 冈崎嘉平太的中国观 48

三 中日复交初期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 55

1. 舆论调查所见日本国民的中国观 56
2. 日本学者的“文革”观 61
3. 日本舆论界及学界的对华认识 66

第二章 崇尚“友好”时期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1979—1992 年) 73

一 崇尚“友好”时期日本政界的对华认识 74

1. 大平正芳的中国观及其外交实践 74
2. 中曾根的国际国家构想及其中国观 83
3. 冷战末期日本政界的国际观及对华认识 91

二	崇尚“友好”时期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102
1.	对中国经济调整及外贸体制的关注	103
2.	对中日合办企业的各种论争	115
3.	理解和体谅对方——稻山嘉宽的对华认识	123
三	崇尚“友好”时期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	131
1.	“友好”时期日本国民的中国观	132
2.	日本学界的中国研究及对华认识	137
3.	日本各界围绕天皇访华的论争	140
第三章	冷战结束后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1993—2000年)	149
一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的对华认识	149
1.	冷战后日本对华合作思想的继承	150
2.	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的主要举措	156
3.	“中国威胁论”的滋生和蔓延	162
4.	冷战后日本对华战略思想的转变	170
二	冷战结束后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180
1.	关注中国经济发展	180
2.	对华投资环境的不同认识	192
三	冷战结束后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	200
1.	日本国民对华认识趋于警惕和消极	201
2.	日本舆论界与学界的对华认识	214
第四章	新世纪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2001—2010年)	225
一	新世纪日本政界的对华认识	225
1.	小泉内阁时期日本政界的对华认识	226
2.	新生代政治家的国际观、中国观及历史观	234
3.	小泉纯一郎的中国观及外交实践	248
4.	后小泉时代日本政界的对华认识	260
二	新世纪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264
1.	“中国经济威胁论”的盛行	265
2.	“政冷经热”时期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279
3.	经济界人士的历史观	293
4.	对近年来中日关系的认识	303
三	新世纪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	309
1.	新世纪日本国民对华认识日益恶化	309

- 2. 新世纪日本学界的对华认识 325
- 3. 大众传媒的中国报道和舆论诱导 339

第五章 日本各界对华认识的演进趋势及主要特征 (1972—2010 年) 346

- 一 日本政界对华认识的演进及特征 347
- 二 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嬗变及特征 355
- 三 日本国民对华认识的变迁及特征 363
- 四 日本各界对华认识的互动与整合 367

参考文献 375

第一章 中日复交初期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

(1972—1978 年)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在谨慎的友谊和敌视状态之间摇摆,围绕反霸条款,日本政界出现了激烈的战略之争。通过对国际体系层次因素的感应认知、与中国的互动重构及国内政治势力的博弈,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中视中国为“朋友”角色的意图日趋明晰,并通过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实现了两国关系法律意义上的正常化。日本经济界人士在推动中日复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国关系正常化为经济界人士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和交流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平台,经济界人士视为“新时代”的来临,并对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显示出积极的态度。基于谋求经济利益和占领广阔的中国市场的考虑,日本经济界人士积极推动政界人士加快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步伐。这一时期,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开始向积极、正面的方向转化,日本学界也对“文革”重新进行审视和评价,以往中国只是想象和揣测的“异邦”,逐步变成可以亲身感知、仔细观察的“真实对象”。

一 中日复交初期日本政界的对华认识

战后初期,日本和中国基于自身条件及国际冷战环境的影响,分别

倒向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敌视对峙的状态。在美国的策动下,日本选择与台湾缔结《日台条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拒不承认的态度,中日两国一直到复交前始终处于敌对状态,日本的对华认知属于建构主义中的“霍布斯文化”状态。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接近,日本的对华认知逐步发生转变,在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在野党势力也加快了推动复交的步伐,经过朝野各界的多方博弈,最终推动中日复交的一方占据了上风,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1. 自民党内围绕中日复交的论争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中美接近的步伐加快,特别是“尼克松冲击”,给日本政界尤其是自民党造成巨大震荡,“亲台派”的主张难以立足,“亲华派”推动复交的动议逐渐得到朝野上下的认同,甚至以往自民党内在中国问题上持中立或暧昧态度的人,也在主张与中国复交的问题上明晰起来。中美关系的解冻迫使向来即以亲美反华著称的佐藤荣作不得不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的因应之策。

中美《上海公报》的签署,使日本各界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力量感到,日本在对华关系上远远地落在了美国之后,因而要求迅速改善日中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说:“联合公报在台湾问题上及其他问题上提出了超过预想的方针。我的印象是,美中关系像乘上了超级特别快车一样,正朝着恢复邦交的方向前进。”他批评说:“日本又被美国搞了‘越顶’外交。这是日本的外交有错误。日本必须推行新的外交政策。如果佐藤内阁不行,就应尽快地让新人出来干。日本也应当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明确的态度。”^①

自民党议员古井喜实也认为:“美中关系向着和解与友好的方向发

① [日]《朝日新闻》,1972年2月28日。

展,可是日中关系由于战争而中断至今,不仅如此,日本战后还充当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帮凶,采取敌视中国的姿态。这就是说,日本已落在世界和美国的后面,应当赶快改弦易辙,奔向日中友好与恢复邦交的正路,是理所当然的。”^①

1972年5月8日,大平正芳首次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提出的政策建议中强调:亚洲地区局势不稳定,“日、中两国应当致力于创造该地区的和平”,“为了完成对亚洲和平负有责任的日中两国的永久和解,我们必须迅速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但是在这件事上我们不能有任何私心和幻想,虽说还有困难,但我想终究是不容回避之事。而且这项事务早就经过了民间协调时期,现在已到了由政府承担责任负责处理的阶段。我再次迫切期待政府应该倾注诚意抓住这个问题,致力于邦交的恢复。”^②6月,大平对中国问题的态度更加明确:“我认为与中国建交的时机已经到来,为此,首先应统一国内认识,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③对于成为复交焦点的台湾问题,大平明确指出:“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日台条约旋即不复存在。实现中日复交,意味着同北京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协议……。从政治上来说,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日台关系就终止了。”^④大平正芳的对华认识在当时的自民党内较有代表性,表明中日复交问题的解决已“如箭在弦”。

基于这种认识,大平正芳担任外相后,更加明确了立即恢复日中邦交的外交方针,和田中角荣首相一道付诸了艰辛的努力,最终实现了田中访华和日中复交。

当时自民党内的亲华派代表人物主要是松村谦三及田川诚一等。1972年6月,在田中政权成立之前,为缅怀松村谦三先生,出版了《松村

① [日]古井喜实著、田家农等译:《日中关系十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② [日]大平正芳回忆录刊行会编:《大平正芳回忆录》,鹿岛出版会1982年版,第215、219页。

③ [日]大平正芳纪念财团编著:《大平正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

④ 同上书,第361页。

谦三与中国》(读卖新闻社)一书,在卷末收入了田川诚一撰写的“日中问题的基本立场”的论文,通俗易懂地阐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道理。主要内容为:

从法律上讲,与中国的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有人主张战争状态由于《日华和平条约》已经结束,但这个条约是在新中国成立两年半以后与逃亡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缔结的,并不是与中国缔结的。在《旧金山和约》缔结之后,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选择了与台湾缔结《日华和平条约》,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将台湾政权视为代表全中国的政府,条约的内容是有限制的。蒋介石已经失去中国领土和国民,因而对中国的处理没有发言权。战争结束后“以德报怨”的声明并不是蒋介石个人的,而是代表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军人采取宽大态度反映了中国的道义,蒋介石确实很了不起,但不能仅仅向蒋介石个人而是要向中国人民感恩。有人说日中战争的对手是蒋介石政权,但是难道忘记了日本政府在战争期间曾发表声明,不以蒋介石政权为对手,并且扶植了傀儡政权的历史了吗?中国政府已经暗示放弃战争赔偿,没必要担忧新的赔偿。^①

田川还在这篇论文中对“亲台派”进行了严厉批评,所谓的“亲台派”是指在“感情上厌恶中国,也不想了解中国,反对与中国恢复邦交的一部分人。这些人笃信反共主义,仅仅因为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体制就忌避中国,害怕由于同中国的交往而使日本赤化。而且,这些人不仅用战前相同的尺度衡量中国,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始终拥有一种优越感。相反,他们中大多数人则对欧美各国抱有一种劣等感”^②。田川的观点在亲华派中很有代表性,并且对“亲台派”反对中日复交的荒谬逻辑进行了批驳。

1972年7月14日,自民党“亲台派”的代表性人物贺屋兴宣向自民

①② [日]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朝日新闻社2006年版,第155页。

党外交问题恳谈会提交了题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对策纲要》，其中体现了“亲台派”势力在中日恢复邦交上的代表性认识。主要内容为：

(1) 努力实现邦交正常化和政府间谈判。(2) 邦交正常化的内容、条件和手续等须按正常程序进行。(3) 两国以对等的立场和无条件的方式进行谈判。(4) 日本方面基于国际间的惯例、信义及国家利益，确定邦交正常化的内容、条件等原则，并征得国民的一致意见。(5) 急于实现正常化，不能屈服于对方所提出的不正当要求。内容若有勉强之点，会丧失相互间的信赖，并可能遗留隐患。(6) 不正当内容不予承认，对日本而言，即便邦交正常化推迟，无论是防卫上还是经济上都无任何危险，也不会有任何不利之点，没必要焦灼不安。(7) 对正常化抱有焦灼感，甚而采取迎合和屈从的态度都会给我方带来不利。(8) 日本方面的原则是和平共存、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不行使侵略方式，国际纠纷通过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承认集体防卫等联合国宪章精神等。日本方面的原则从文字上看与中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致的……(9) 中共……通过进行日本军国主义化的宣传等，企图弱化日本的自卫力，同时也不乏具有实现日本共产化革命的潜在意图。针对这些事实，在谈判的同时，日本也有必要整備国内体制。(10) 中共主张的所谓三原则，以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想法为核心……《日华和平条约》当然有效，单方面变更、废止是非法的、不合理的。(11) 对于台湾问题在日中谈判中加以处理的看法，是非法的、不正当的大国主义，是否承认台湾的存在。(12) 关于台湾的领土权等问题，在日美之间出现处理方针不同的情况下，将会引发《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适用范围等重大问题，系事关我国国防之根本的问题。(13) 日本承认台湾为中共领土的情况下，中华民国可能对日本采取报复措施。对此有必要加以充分认识。(14) 至于有关对中共进行谢罪、赔偿的议论，其根据难以获得承认。这是有关事实的确认，从国家利益和国际间义务的

角度上有必要进行慎重的讨论,不应一味停留在口头上。过去日本曾一时受国内情绪的控制,也由于政府懈于慎重考虑,从而进行日德合作、签署日苏中立条约等,经历过重大的战略失误,给日本的前途命运带来极为巨大的危险,在中国问题上也有必要进行深刻反省。上述备忘录式的要点是我国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上应采取的态度和方针,有关事关紧要之点几乎毫无遗漏地加以记述。^①

1972年8月,贺屋兴宣撰写了“力戒抛弃台湾之暴举”的文章,除了表明承认中国在国际法上未必意味着抛弃台湾的法理论外,还列举了不应该抛弃台湾的六个理由:(1)日本与台湾具有长年的亲善关系;(2)日本与台湾都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相互提携合作;(3)日本与共产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却与自由主义“国家”之间关系非正常化,这是不合情理的;(4)台湾未对日本作出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单方面断绝关系是失礼而违反道义的;(5)日本对台湾欠有四方面重大恩德;(6)日本并不存在必须背弃重大恩德那样的紧急事态和危险。^②

对于“亲台派”而言,不应背叛“知遇恩人”的心境是息息相通的。贺屋在这篇论文中还发表感叹,“日本人对于这种恩惠至今尚未进行正式感谢,也难以说通过具体的行动进行过报答。重大恩情是必须报答的,对此非但无所作为,与之相反,……违反情理和信义断绝国交,诚然是最大程度的不道德。”^③

贺屋兴宣在述及没有必要急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理由时指出:(1)日中之间的战争状态已经在1945年8月结束了。(2)日本当年是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权交战,而不是共产党政权。共产党政权是1949年才成立的。(3)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派兵支援北朝鲜,越南战争中支援北越,以及援助日本的革命势力来看,中国标榜的“互不侵犯”等“和平

① [日]贺屋兴宣:《战前战后80年》,经济往来社1976年版,第323—325页。

② 同上书,第343—346页。

③ 同上书,第346页。

共处五项原则”是不可信的,等等。^① 这些因素也是“亲台派”极力抵制中日复交的原因所在。

1972年8月3日,大平正芳外相在常任干事会上,就田中内阁成立以来为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所作的努力及在这一问题上日本政府的态度,向与会者作了说明。大平提到:“在与台湾继续保持‘外交关系’的前提下,日中双方很难就邦交正常化达成一致。”对此,“亲台派”干事立即进行了反击。自民党内的“亲台派”首脑人物贺屋兴宣很不满地对大平说:“台湾问题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不应该轻易作出‘断绝外交关系’的决断。”他还说:“光是中国方面提出许多原则,而我方却没有原则,这太不可思议了。”^②除此之外,其他的“亲台派”干事也纷纷发言,反对日本与台湾断交。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1) 如果日本与台湾断交,台湾方面必将采取报复措施,到那时,中国能制止台湾吗?(2) 断绝“国交”,只有在对方作出有损于国际信誉之举的情况下,才能够提出。如今,台湾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非礼之举,日本却主动放弃“中华民国”,这只能说是一种(对中国的)“下跪外交”。(3) 政府打算全面屈服于中国吗?^③

日本自民党内的“亲台派”成为推动中日复交的最大障碍。

然而,由于中日复交在朝野上下已是大势所趋,“亲台派”势力也不得不赞同复交。不过,“亲台派”势力的代表性人物贺屋兴宣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内容从结果上看,最终应该体现如下要点:

第一,与中共重新缔结邦交(台湾、澎湖岛、金门、马祖,即中共统治未及区域不承认为其领土);第二,与台湾的邦交一如既往地继

① [日]贺屋兴宣:《战前战后80年》,经济往来社1976年版,第301—302页。

② [日]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邦交正常化》,南窗社2000年版,第159页。

③ 同上书,第160页。

续维持(日华条约将来依然有效);第三,日本与中共的邦交原则依据联合国宪章精神(因此,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持异议,只是应明确写明承认集体防卫构想);第四,中共应保证,今后应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进行支援他国革命、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动(对于中共、台湾双方真实的统一愿望,日本表示充分理解)。^①

“亲台派”的主张仍然是在继续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的状态下与中国恢复邦交,这显然不能获得中国的承认。“亲台派”势力反对抛弃台湾,不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认为废弃“日台条约”是非法的、不合理的,而其立论的主要依据大多是蒋介石对日本的恩德,日本不应背信弃义。“亲台派”的主张是既想同中国建交,又继续和台湾保持官方往来,实质是想制造两个中国。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对华认识及其一系列举措虽然给中日复交设置了诸多障碍,但历史的车轮还是无情地将这种难以立足的奇谈怪论碾得粉碎。经过自民党内的反复权衡,最终作出了“选择中国”而“抛弃台湾”的决策,暂时给自民党内有关“中国问题”上的论战画上了休止符。

在恢复日中邦交大势所趋的形势下,自民党内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已不再是要不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是如何实现的问题。具体而言,即日本在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应持何种立场。自民党内的分歧点主要集中在台湾问题上:即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要不要废除日台条约,断绝与台湾的政治、外交关系等问题。虽然大多数自民党人士主张承认“复交三原则”,但仍有少数顽固的“亲台派”势力坚持“两个中国”的对华认识,主要代表人物有岸信介、佐藤荣作、贺屋兴宣、滩尾弘吉、北泽直吉等。此外,党内元老椎名悦三郎也是一个“亲台派”人物。就在田中在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首次会议上讲话的当天,岸信介、贺屋兴宣等人也召集了 19 名日本众、参议员举行所谓“外交问题恳谈会”,提

^① [日]贺屋兴宣:《战前战后 80 年》,经济往来社 1976 年版,第 354 页。